

【文艺评论】

书写新时代重庆文学事业的答卷

□何浩

今年是《红岩》杂志创刊70周年。作为重庆唯一一份公开发行的文学刊物，回望过去，《红岩》走过了光辉70年；新的起点，还要继续书写好新时代交给的文学答卷。

赓续红色血脉，书写好传承红岩精神的文学答卷。《红岩》杂志诞生于重庆这块英雄的土地，继承了红岩精神的光荣传统。刊发过彭荆风《解放大西南》、周梅森《天下大势》、徐锁荣《海神》等许多讴歌党、讴歌英雄、讴歌人民军队的主旋律优秀作品，用文学方式呈现了红岩精神跨越时空的力量。新的赶考之路上，必须始终记住自己的名字、牢牢秉持办刊的宗旨，深度学习习近平总书记“七一”重要讲话精神和关于文艺工作的重要论述，不断增强“四个意识”，坚定“四个自信”，做到“两个维护”，牢记“国之大者”，自觉从百年党史中找准文学坐标，用足用活各种文学体裁和形式，讲好红岩故事、讲好英雄故事、讲好重庆人民的故事、讲好新时代“四个伟大”的故事，在展现红岩精神革命年代独特魅力的同时，更好地彰显时代价值，让红岩精神在中国共产党的精神谱系中永放光芒。

坚守高远理想，书写好建设文化强市的文学答卷。文学是影视、戏剧、美术、音乐等艺术门类最大的

IP。《重庆谈判》《芦花恋歌》《被告山杠爷》《马文的战争》等许多广为人知的影视剧，都可以追溯到《红岩》刊发的优秀文学作品。在过去的岁月里，杂志团结、服务、推出了一大批名家名作、新人新作，成为立足重庆、面向全国的一面文学旗帜。新的赶考之路上，《红岩》要始终站稳人民立场，坚持为人民服务、为社会主义服务这一根本方向，侧耳倾听、用心思考、挥笔书写，倾力表达世界的多姿多彩，生活的日新月异，百姓的悲欢离合，深度参与和陪伴读者的进步成长。始终坚守价值取向，坚决贯彻文娱领域综合治理工作要求，自觉肩负起启迪思想、陶冶情操、温润心灵的重要职责，不断输出反映时代气象、讴歌人民创造的精品力作，进一步放大文学评论音量，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生动形象地融入作品、产生影响。始终把好物物质量，坚持内容为王、品质至上，持续提升杂志的思想内涵、格调品位、艺术境界，在重庆建设文化强市的道路上贡献力量。

争取更大光荣，书写好改革创新发展的文学答卷。《红岩》的历史，要追溯到1951年创刊的《西南文艺》。除了新中国第一份文学期刊《人民文学》，在国内有影响的文学刊物中，她的办刊历史是比较悠久的。在各个重大历史关头，《红岩》都能感国运之变化、立时代之潮头，发解放思想先声、为伟大转折放歌。比如，获得首届茅盾文学奖的《许茂和他的女儿

们》，引发了全社会对农民命运的关注与思考。记录世界级难题三峡移民的《一步三回头》，反映重庆市井生活的《门朝天开》等等，都以文学的形式，深度参与国家和城市发展进步的重大进程。

当前，文学创作生态、作品表现形态、刊物生存状态都发生了很大变化，文学期刊普遍面临发行量锐减、读者流失、编辑队伍青黄不接等现实困难。文学刊物必须以高度的时代敏感、长远的历史眼光、强烈的创新意识，找回自己的位置和价值。变“办公式办刊”为“开门式办刊”，走出编辑室，走进读者群，做杂志的“客服”，真正了解社会大众需要什么样的作品、喜爱什么样的刊物，用影响因子作为核心评价指标，实现文学原创力与作品影响力有机统一。变“组稿式办刊”为“组织式办刊”，充分发挥专业文学期刊的比较优势，让编者、作者与读者“三者”之间形成良性互动，引导创作方向，引领审美风尚。变“投递式办刊”为“转化式办刊”，以开放的姿态和包容的心态，积极融入数字时代和网络环境，以“重庆文学公开课”“大众书评”等有声、视频等形式丰富文学阅读新体验，拓展杂志发展新空间。

新的赶考之路上，我们一定要更加珍惜《红岩》这个稀缺资源，用好《红岩》这个文学阵地，继承老一辈“红岩人”的光荣传统，担负新时代赋予的职责使命，奋力书写重庆文学事业的答卷。

另一座南山

□李元胜

有的山，去过很多次，发现除了时令变化外，多数景物几乎原封不动。于是，慢慢就有点厌倦，除非陪客人或者有聚会，不愿再去。同一座山，多数人用的是同一种游览模式，几乎相同的线路，几乎相同的感叹。过十年再来，连感叹也变化不大，怎么会不厌倦。

但是南山例外，因为去得太多次，多数时候不是为了旅游，我发现了很多适合徒步的小路。刚参加工作的时候，喜欢带一本书去徒步。读书和读山差不多，溯溪而上，是最美的，也就是说，从书中寻得有意思的线索，自行探索，人家觉得枯燥的书，你能读到曲径通幽，有点像离开了景区的主线，进入到它的后花园去，看到一本书的真正宝藏。

在我自以为对南山很熟悉的时候，一位朋友带我去了一个地方。在大金鹰公园对面，有一条不起眼的小路，看起来是进入几户人家，实际上它左弯右拐，最后昂首向上。沿着它翻过一个小山头，向左走上几十步，眼前就会出现一个海子，一个简易的木桥横跨其上，桥的尽头竟然还有一户人家。这是我第一次见到山水湖，而且，完全被它迷住了。

原来，我自以为熟悉无比的南山，还可以突然解锁一个隐秘的空间，让我目瞪口呆。

再后来，这就是徒步的我，经常遇到的事情了：在香樟林的一条小路的尽头，我发现了一片白花醉鱼草，获得了蹲点拍摄三种南山早春蝴蝶的机会；在山水湖农家的旁边，我沿着一条小路散步，竟然无意中来到了南山最高峰春天岭……南山不断为我解锁它的隐秘空间，感觉它的宝藏，是无穷无尽的。

南山最新为我解锁的是塗山书画社。此次去涂山寺，才知道从寺里一建筑内拾阶而上，到了三楼，就是大名鼎鼎的塗山书画社。书画社除了有艺术家们交流用的茶室外，还有一个展厅，展出了不少书画社历届社员的作品。

信步走进去了逛了逛，一眼就看到蔡岚先生的仕女图真迹，不禁吃了一惊。接着，又看到了杨竹民的墨竹和黄笑芸的书法作品。涂山寺中，可一次观赏到涂山三杰的作品，确实令人惊喜。

抗战期间，文化精英汇聚山城，坐拥南山的南岸也成为他们居住或雅聚之地。

1917年出生于杭州的蔡岚，因家境清贫，12岁读完小学后，他就先后进入照相馆、药房当学徒，13岁在杭州“王星记”字号从师学画并在上海、杭州售画，有机会接触到名家作品，视野逐渐打开。他以明代工笔画名家陈洪绶（号老莲）、清代擅画仕女的费丹旭（号晓楼）、改琦（号七芴）等为师承，打下了扎实的线条功夫。

抗战开始后，在家乡已有才名的他迁居南岸的海棠溪。为谋生计，蔡岚投身实业，创办企业，制造胶板、风箱、石棉等。历尽劫波的他，晚年重拾画笔，重温工笔之梦。

工笔画，是典型的中国画技法，以工整细致写实为主，讲究对景象人物的精确还原，有如古代的照相术。有趣的是，蔡先生先做照相馆学徒，后学工笔画，仅以人类的科技手段的角度来说，是图像记录现实方式的一种倒退。不过，艺术有着和科技不一样的方向。照相术出现后，工笔画仍旧是中国画的重要表现形式。显然，这门艺术的价值不仅仅在于精致的写实能力。

蔡岚的精神恩师陈洪绶，在人物画上极有天赋，他曾以十天时间画一石刻像，人人都说临得像，他并不满意，又用十天时间去临摹，终于人们都说不像了，他才心满意足。

这个故事故很有意思。工笔画的价值，既在于临摹现实的逼真，也在于和现实的差异，前者看得出画家的修炼和功夫，后者呈现画家的才情和格局，两者在一件作品中的互动和平衡，决定了它的境界和价值。

“你说，蔡岚先生为什么喜欢画古代仕女？”在观展时，我听到一位朋友的发问，但隔得太远，被问者的回复我没听清楚。

这是一个很容易想到但并不容易回答的问题。工笔画兴于战国，唐代人物画已逐渐成熟，从技法角度来说，也可以说是线描艺术的逐渐成熟。

从原始社会开始，人类就学会了用简洁的线条来描述他们所理解的世界。线条一开始，就不是对客观对象的简单临摹，它是从视觉的角度，对事物的归纳和提炼，或者说是描述世界的工具——种语言。

当中国线描艺术这个工具系统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不断进化，它变得更复杂更有能力，既能更准确地呈现出临摹对象的各种特点，也能表达出作者的境界和意趣。每一个优秀的画师对自然的提炼，都增加了这个系统的语汇和符号。它最终成了悬浮在真实世界之上的另一种现实，有着自己的逻辑和空间，承载着中国人的想象和情怀。

那么，蔡岚先生在重拾画笔时，其实有两个选择：一是把前述系统中学到的技艺或者说绘画语言，用来描绘他身边的时代；二是疏离眼前，让自己成为系统中的一部分，在前人的典型符号上重新创作。

他选择了后者。他对进化千年的中国工笔画线条技艺的大彻大悟，更适合在古典题材上发挥，而且可以凭借个人之力将它推向某个极致。同时，他理想中的中国人物的诗意之美，也更适合古典人物和服饰来呈现。

上世紀的涂山，是如今南山的一部分。生活在涂山范围内的书画家，不止是蔡岚。

山西介休人杨竹民，原名作民，因喜欢竹子，索性改名为竹民。他18岁考入北平京华美术学院国画系，师从周怀民等京城名家，1937年流亡至重庆南岸，在尝试过教师、警员等职业后，还是以卖画、刻印为生。

杨竹民擅长写意，水墨画竹更是长项，1984年作品墨竹被中国美术馆收藏，被誉为“西南一枝竹”。

写意画从唐代起为文人偏爱，和工笔画比，如果工笔画是楷书，写意画就是草书，它更多表达的是作者心中的世界，由于不拘泥于细节，反而能得山水自然的神韵。

蔡岚、杨竹民和书法篆刻大家黄笑芸并称涂山三杰，像涂山的三座山峰，他们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和同道们一起创立了塗山书画社，讲习书画，交流技艺，培养出了一批知名艺术家。

和南山有渊源的远远不止是涂山三杰，也不止是塗山书画社。在这个著名的书画社创立的前后，重庆文学界在南山上创办了“南山笔会”。我当时在重庆日报工作，业余爱好文学创作，先后参加了两次“南山笔会”，一次长篇小说“南山改稿会”。那个时代的重庆文学界人士，上南山是常事，写南山也是常事。

三年前，我给南岸区的领导提到南山当年的文化盛事，没想到意外促成了中断多年的“南山笔会”重新开启，而且由重庆名家笔会升级成了全国名家笔会，十余位活跃中国文坛的大家同访南山，写出了一批作品。

所以，由春天岭、山水湖、香樟林、放牛村组成的是一座自然的南山，由涂山三杰和历代文人组成的是另一座文化的南山。自然的南山，我差不多走遍了；而文化的南山，我才刚刚站在山门前，里面的万千景象，等待着更多的人一起寻访和发掘。

摇曳的蒲苇

□徐文峰

一大早，班长发来微信。视频上，班长头顶浅色礼帽，系着花围巾，戴着大墨镜，嘴里不停地哼着“爱恋伊，爱恋伊”的歌儿。她的旁边是高高的蒲苇，银白色的硕大花穗迎着徐徐清风，伴着班长翩翩起舞。

班长是我中学的同学。我急忙丢出文字：“人美景美。在哪里疯？”“嘿嘿。这是昨日，众姐妹在双桂湖玩时拍的抖音呢！”班长打趣地回答。

哟！双桂湖的蒲苇去年我见过，没想到一转眼就长高了，长壮了，长美了。

此时，想去看一看的冲动撩拨着我的思绪。窗外，淅淅沥沥的小雨没有阻止我，我倒像顽皮的娃娃敲击着我的心鼓：“快去快去嘛！”

于是我没有犹豫，约上好友二娃子驱车来到双桂湖畔。

先来到张桥烟雨处。小雨一直在下，打在雨伞上微微作响。但雨中的双桂湖特别宁静，静谧而空灵。雨飘落湖水上形成的水花也没有一丝声响，涟漪谦逊起来，白鹭也低头悄悄觅食。水面上，《关雎》中描述的左右采之的“参差荇菜”独自婀娜着身姿。

蒲苇在哪儿？爱恋的蒲苇在哪儿？哦，到了。来到双桂湖西岸，大片的蒲苇与我撞个满怀。太壮观了。一岸的蒲苇花摇曳在风中。银白色的花穗越过浓密的绿色叶片挺拔于苍穹之下，远看像高粱穗，也像放大的芦苇穗，硕大而绵长。

走拢一看，呵！好家伙，每束蒲苇竟高达3至4米，茎秆粗壮，约2至3公分。兴许是雨水的滋润，湿漉漉的蒲苇随风摇曳，生机勃勃，盎然一片。

初识蒲苇，是在中学语文课本《孔雀东南飞》一文中。只是那时没亲眼见过蒲苇，认识还是肤浅的。后读宋代唐庚的诗：“湖边冷艳浸秋蒲，湖上寒光转夜乌。”对蒲苇有了进一层的好感。

我亲眼看见蒲苇还是2020年冬陪记者采访梁平区湿地润城，第一次看见蒲苇也是在双桂湖。那时双桂湖的蒲苇还未长大，没有一人高，我错把蒲苇当芦苇。同行的管理中心主任告诉我：“这是蒲苇，多分布在华北、华中、华南、华东及东北地区。”他还说，蒲苇对土壤、环境要求不严，易栽培，可露地越冬。

没想到，几个月的阳光雨露，小小的细细的蒲苇竟长成“俏丽若三春之桃，清素若九秋之菊”的亭亭“大姑娘”了。

又一阵微风吹来，挟带着雨点，萧萧瑟瑟的。我缓过神来，看见眼前的蒲苇摇曳得更加厉害。湖边的狭长蒲苇一会儿整齐地向东倾斜，一会儿一致地向西倒去，一会儿又齐刷刷地弹回保持向上的姿态。

此时的双桂湖“像雨像雾又像风”，让我想到了一个人，一个中学时教我们英语的女老师。她姓许，名牌大学毕业，从遥远的北京来到条件艰苦的县级中学任教。她乐观开朗，向上向善，微笑始终在她的脸上。

后来，许老师调回了大城市。而今同学们聚会，我们常常提起她，感恩她。

许老师不正是一颗虽为风倾不为风折的蒲苇吗？

我陷入了沉思。二娃子提醒我，一上午了，该打道回府了。

回望着双桂湖的蒲苇，回望着风雨中的蒲苇，我眼前一亮，哦，摇曳的蒲苇，颜值里是温良谦逊的蒲苇；摇曳的蒲苇，气质上是坚韧高贵的蒲苇。



立冬（中国画）

陈茂华

【百年荣光】

轮子“滚”出幸福来

□李伟

如果说生活是一条路的话，有一个关于“轮子”的故事，恰好可以把我童年以来的轨迹串连起来。它不但“滚”圆了我 and 乡亲们一个个美丽而幸福的梦想，也见证了时代的发展与进步。

滚铁环，对于现在的孩子来说几乎未见，但在上世纪70年代，却是孩子们不可多得的游戏方式。

为奖励我当选为“三道杠”的少先队大队长，父亲特为我制作了用篾条叠加而成的“篾环”。虽然这种“篾环”在地上滚起没有响声，铁钩在后面推起来轻飘飘的，但这也是一件十分骄傲的事情。我身后照样会跟着一大批起哄的孩子，其中小我一岁的同伴红毛声音最响亮。

后来通过种种努力，伙伴们先后有了箍木桶用的“铁丝环”，细钢筋做的“钢丝环”，最牛的还是红毛从榨油坊里搞出来的“钢箍环”。

寂静千年的小山村，仿佛被安在铁环制作的“轮子”上转动了起来——每到清晨，伙伴们便会汇聚于上学路上，铁钩推着铁环，滚动的铁环碰撞着石板路面，因滚铁环摩擦和撞击产生的辘辘声，便会响成一片，叮叮咚咚，嘈嘈切切……

“洋马儿光骨头，上头坐的大牯牛……”儿时我们对公路上骑自行车的行人，常怀一种嫉妒心理。后来渐渐大了，谁家有一辆“洋马儿”，肯定是在同伴中特有面子的一件事。

在我小学毕业的时候，刚刚上班的姐姐也买了一辆“飞川”牌自行车。到我初中的时候，这种新型的带有现代化特色的两轮“铁骑”，犹如山里五月的金银花，在乡村“遍地开花”了。

伙伴们骑车时间长了，自然要弄出一些花样来：有坐在后座上骑的，有在横梁上骑行屁股扭来扭去的，还有下坡时不握车把“放空档”的。

也是红毛胆子最大车技也最好，一辆自行车上可以带六七个孩子，还能够独自在乡间的田坎上骑得飞快。当其他孩子再喊“洋马儿光骨头，上头坐的大牯牛”时，我们会一起回答“洋马儿光是铁，上头坐的太师爷……”红毛的声音依然最响亮！

在上世纪90年代初的老家，拥有一辆摩托车绝对是对财富和身份的象征。家乡的矿石资源多，一些靠

烧石灰、办碎石厂富起来的乡亲，急需这样的标签来显示自己的与众不同。

那年8月，刚上班的我还在一个工厂里领着两三百元的月薪。一天，毕业后在家帮父亲经营石灰窑的红毛，骑着一个红彤彤的铁家伙来到厂里，说带我出去兜风。

摸着他那个壮壮实实的坐骑，我小心翼翼地问：“摩托车吧？”“当然！”红毛无不得意地回答。“花了不少吧？”“不多，也就六七千块。”红毛轻描淡写地说道，惊羡得我舌头伸得老长。坐在红毛摩托车后坐上，听着耳畔呼呼的风声，看到路人一个个羡慕的眼神，我的感觉就一个字：爽！现在回过头来想起此事，那只是一辆小排量的“红鸡公”而已。

当历史的滚滚车轮驶向新世纪时，老家那些先富起来的一批人，已经开上自己的私家车——两个轮子变成四个轮子了，汽车开始扩张乡亲们的生活半径。

尽管当时汽车对普通老百姓来说还是奢侈品，但红毛家不但拥有了运碎石“东风”牌翻斗车，还率先买了一辆“开起要”的长安面包车，后再来又换了进口轿车，洋牌子的新能源源家。为工作和生活方便，2010年我也买了一辆国产轿车，花下来不到十万元。

如今在乡村，无论哪家只要出门，也不论远近，他们总是笑呵呵地从家里把两轮或三轮的电动车往外一推，便绝尘而去。

村里的人行水泥便道早已修到了田间地头，乡亲们出门干活，运肥乃至掰苞谷、捋谷子都是用这种所谓的“电马儿”，把丰收的喜悦运回家。独轮车成为历史，“电马儿”成了乡亲们的帮手，成了乡亲们的脚。

得益于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，老家“四好”农村路也越来越完善，宽敞的水泥路从入村进社到入户。乡村道路好了，乡亲们钱包鼓了，安全快捷方便的家用轿车开始普及。不同品牌轿车不但成为乡村婚礼的标配，也是山里人飞往外面世界的翅膀。

周末驾车回老家，一辆价格不菲的赛车型自行车忽然刹在我面前，骑行者揭开头盔露出一个光头来，原来是几年不见的红毛。

细聊得知，红毛已关停矿场，建起了林木专业合作社，正给以前开山取石的山场种植油茶苗复绿。红毛说，绿水青山才是金山银山，下半辈子要把先前毁掉的树林补回来。

滚滚车轮见证了乡村发展和时代变化，同时也载着人们奔向幸福美好的下一站。